

学人

文丛

# 大国战略与世界秩序

石斌著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学人

文丛



# 大国战略与世界秩序

石斌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战略与世界秩序 / 石斌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9

(学人文丛)

ISBN 978 - 7 - 305 - 20132 - 5

I. ①大… II. ①石… III. ①国家战略—研究 IV. ① D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837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学人文丛

书 名 大国战略与世界秩序

著 者 石 斌

责任编辑 官欣欣 编辑热线 025 - 83593947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38 字数 475 千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20132 - 5

定 价 15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南大亚太论丛》

主 办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列)

- 蔡佳禾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顺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陈志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吉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洪银兴 南京大学商学院  
孔繁斌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石 斌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石之瑜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孙 江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月清 南京大学哲学系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凤阳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朱庆葆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石 斌

副主编 李里峰 毛维准

成 员 祁玲玲 舒建中 赵光锐

姚 远 吴小康 宋文志

---

### 《学人文丛》编辑组

石 斌 蔡佳禾 李里峰

毛维准 舒建中 李恭忠

##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得于 2016 年夏初创设并渐次成长，“南京大学郑钢亚太发展研究基金”之专项全额资助，实乃一大助缘、大善举；众多师友、同道的鼓励、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样厥功至伟。

此一学术平台之构建，旨在通过机制创新与成果导向，以国际性、跨国性与全球性议题为枢纽，将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具有内在关联之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与学术人才，集成为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群”，对大亚太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并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所谓“亚太”，取其广义，乃整个亚洲与环太平洋地区之谓。不特如此，对于相关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亦属题中之义。盖因世界虽大，却紧密相连。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人类命运实为一荣损相俦、进退同步之共同体，断难截然分割。面对日益泛滥的全球性难题，东西南北，左邻右舍，各国各族，除了风雨同舟，合作共赢，又岂能独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谓“发展”，固然有“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多重意蕴，亦当有“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价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侪身为黉门中人，对于大学之使命，学人之天职，理当有所思虑。故欲旧话重提，在此重申：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之两翼，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二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秉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大,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乃享誉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独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且英才辈出、薪火相续。于此时代交替、万象更新之际,为开掘利用本校各相关领域之丰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团队,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亚太中心学术同仁之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彰显南京大学之研究水平与学术风格,我们在《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集刊已相继问世的基础上,决定再做努力,编辑出版《南大亚太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设门户、画地为牢,绝非智者所为。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如群流,归于大海”,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现象,惟有将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便如朱子所言,“见一个事是一个理”,难入融会贯通之境。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丛》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故此,《论丛》之内容,并不限于一般所谓国际问题论著。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诸层面,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译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刊行之列。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撰写或译介各种专题系列丛书,以便集中、深入探讨某些重要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程,昭明自身学术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所执守之学术立场,亦即

《论丛》之编辑旨趣：一曰“本土关怀，世界眼光”；再曰“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三曰“科学与人文并举，学术与思想共生，求真与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冀望学界同仁、海内贤达继续鼎力支持、共襄此举，以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缘起。

石 斌

2018 年元旦于南京

## 代序：国际问题研究要有知识关切<sup>\*</sup>

**【原编者按】** 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话题，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石斌教授，请他就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相关问题发表看法。

### 一 知识关切是学术创新的动力和价值所在

记者：中国的国际问题学术研究起步较晚，过去我们主要以学习和借鉴为主，随着中国的发展，自主创新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你觉得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学术创新有公认的一般规律和基本条件。但我觉得，就研究者自身而言，首要问题是必须有知识关切。所谓“知识关切”，用英文大概可以表述为 intellectual solicitude，可以理解为“智识、思想或精神关切”，

---

\* 本文出自一次“访谈”，实为报社的命题作文，最初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18日，题为“国际问题研究要有知识关切——访南京大学石斌教授”。由于报纸篇幅有限，当时仅刊出前两个部分，并略有删节。此处为完整的原稿，仍然保留“问答”的形式。此文大致能够反映笔者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现状与前景等相关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故放在本书前面，作为“代序”，庶几聊胜于无。



当然也有“人文关怀”的内涵。我的意思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无论从事何种领域的学术研究,对本民族的国际处境和发展需求,尤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希望实现的抱负,应该有某种既富于情感又不乏理性的关切、渴望、牵挂,甚至“焦虑”。作为“公民”而又研究“国际”问题,更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情感寄托”。这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常识和“大道理”。人们总是说,学术研究需要有“问题意识”,但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意识本身从哪里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关切,否则有问题你也视而不见,或者漠不关心,学术创新也就失去了内在、持久的动力。有什么比“上心”更能激发一个人的潜能和创造力呢?又有什么比自我关切更能让我们保持头脑清醒而不至于飘飘然随“(西)风”起舞呢?反过来讲,如果不是出于这种关切,只是为了个人功利,“著书都为稻粱谋”,所谓“创新”岂不失去了最基本的价值和意义?记得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某个时期,国内学术界曾流行过一个口号,叫作“思想淡出,学术出场”。其中一个意思,似乎是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只是“纯粹”的学者,而不再需要思想者。老实说,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正如我不认为钱钟书没有思想,或者鲁迅没有学术,更无法想象,“没有思想的学术”是个什么形态,或者有什么实际价值。

## 二 美国研究应更加重视美国对外行为的国内根源

1. 记者:如何体现这种“知识关怀”,能不能联系你所从事的研究具体谈谈,比如说美国外交研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无疑是美国世界地位的变化及其对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但应该有一个较长的历史尺度,至少对二战后至今的美国外交作整体考察。其中应着重探究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战后美国全球性主导地位的确立、巩固或维系,与美

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或调整之间具有何种联系？相关的问题是，美国对外政策精英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出战略选择，以达到确立、巩固或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目的？他们所秉持的战略观念有哪些基本特征？对于美国安全战略的缔造以及全球地位的确立、巩固或维系产生了哪些影响？与美国主流政治文化与战略文化有何联系？

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与结果，是美国全球性主导地位的建立和巩固。冷战结束时，美国的地位非常突出，不仅成为绝无仅有的政治、军事与经济超级强国，“美国生活方式”、“美国式民主”更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话语。而美国这种独特地位，尽管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但总的来说主要是在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后冷战时期美国霸权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所采取的反应方式等许多基本问题，就其历史根源而言，也大多是在冷战时期孕育或形成的。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可以提供某些历史启示。美国是“守成”大国，关心的是维持主导权，中国是新兴大国，关心的是争取发展权。同样是研究美国，中国学者的“知识关切”与美国同行理当有所不同。

## 2. 记者：那么，你怎么看近几年有关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论？

美国人但凡在国内外遇到点难题，就会出现这类议论。无非是自我警醒，这正是自我关切的表现。这恰恰是他们的长处，并不是说美国丧失了自信，真的不行了。如果回避问题，那才叫不自信呢。一个民族必须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和勇气，否则便如鲁迅所说，“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后，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些美国人就开始担心被苏联赶超，越战失败和布雷顿森林体制瓦解以来，“衰落论”已出现过好几轮。越战后美国国内的“冷战共识”破裂，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外交理念（对外反共产主

义、对内反孤立主义)的冷战精英集团瓦解,但还有更大的共识没有瓦解,那就是维持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捍卫美国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事实上,直到冷战结束,美国霸权不但没有被“唱衰”,反而总体上不断得到巩固。

很明显,美国霸权的思想基础,从来没有真正动摇过。美国“霸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美国意识形态即美国生活方式具有普世性与优越性的深刻信念密不可分。美国权势的扩张与美国“生活方式”的拓展并行不悖。一个国家追求自我利益不足为奇,奇特的是把自我利益、自身价值包装成人类共同利益与普适价值。战后几代美国战略与外交精英,尽管主张不尽相同,但出发点都是为了确立、巩固或维系美国的全球地位,这是他们在大战略目标上的一个核心共识,为此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甚至过头的危机感和战略忧患意识,特别是对外部挑战的防范心理。战后美国所拥有的世界地位,就思想和战略层面的因素而言,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种战略意识或战略共识。

要判断美国的兴衰,除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作比较,首先要看美国国内那些造就和支撑美国权势的基本要素是否发生变化。美国在政治、军事、技术、社会等众多领域的有利条件和总体优势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与其说美国衰落,不如说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力量的崛起增强了美国人的危机感。与其人云亦云地谈论美国“是否衰”,不如从我们自己的关切出发,研究它“何以兴”。

### 3.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应该加强对美国国内状况的研究?

当然。必须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国内根源,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根源。美国的对外行为,尽管常常贴着“海外义务”的标签,其实更多地是出于国内需要。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源至少涉及三个层次:国际环境、国内社会和政府。我们较多重视国际环境因素,或较多关注政策结果,忽视导致这种结果的国内政治进程。在政府

层面,也主要关注总统及其行政部门的作用,对于因宪法依据、历史先例、司法裁决和国内政治生态等因素而造成的复杂的行政—立法关系,特别是在对外关系领域的权力消长和政策影响,研究还很不充分。在国内社会层面,诸如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公众舆论、选举政治、集团政治(社会运动、利益集团、军事—工业—科学“联盟”)等多种因素,以及美国外交的决策机制、决策模式与决策进程,都有待联系实际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要了解的不只是其一般规律和基本特征,更重要的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力量消长和动态发展。总之,不能满足于解读美国的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报告或领导人讲话之类的东西,这些大多只是政策结果,而不是原因和过程。

亨廷顿在《孤独的超级大国》一文中指出,正是在 uniqueness, virtue, power(独一无二、乐善好施、无所不能)这三个词所表达的“美国信念”支配下,美国在冷战后采取了一系列单边主义行为:在“人权”、“民主”问题上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模式和价值;防止别国发展军事能力以维持自身军事优势;将国内立法应用于国外社会;在毒品、恐怖主义、核武器与导弹扩散、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问题上以美国标准给其他国家划线、“打分”,并对“不及格”者实施制裁;在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旗帜下推进美国公司利益;出于同样目的塑造世界银行和 IMF 的政策;干涉与其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地区冲突;胁迫他国采取符合美国利益的经济、社会政策;促进美国对外军售同时阻止别国军售;操纵联合国秘书长人选;精心挑选波、匈、捷为北约首批东扩对象;对伊拉克等多国采取军事行动或经济制裁;以“流氓”罪将一批拒绝向美国“磕头”(kowitz)的国家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

如果忽视其国内动因,很难理解美国的上述行为,也很难弄清楚,美国究竟是一名维护全球正义的“黑猫警长”,抑或本身就是一名“恶霸”?

### 三 中国需要基于国家核心价值的大战略“共识”

记者：美国对外行为的确深受其主流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影响，但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这些东西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吧？

是的，这也是“美国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些，美国也就不成其为美国了。一个国家需要靠共识来维系。国家或社会核心价值就是共识的体现和产物。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国家核心价值观。这不仅是凝聚全民共识、维系国家认同的精神纽带，也是处理对外关系、塑造国家形象的思想坐标。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与感召，一个民族就会精神涣散。没有最基本的共识，会失去凝聚力和方向感。不过，没有分歧的“共识”，或者说没有经过充分讨论而强行灌注的所谓“一致性”，只是一种“幻象”，并不是真正的共识，也不会由此获得前进的动力。

美国人每到关键时刻，例如越战失利、冷战结束以及“9·11”事件、金融危机等问题出现后，都会展开战略辩论，目的就是想认清形势，找到方向，重建共识。而共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基础，即美国社会从来没有真正受到过挑战的相对简单划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这就是说，外交价值观、大战略层面的共识，是建立在国家或社会核心价值之上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也包含这个道理。

中国同样需要有战略共识。这意味着至少对国家大战略的基本目标和主要手段，包括能够和值得投入的人力、物力和精神资源等问题有广泛的一致看法。例如对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国际身份、国际处境、国际政治理念和外交价值观有明确的认识，对中国复兴的目标、途径及其国际政治效应，对当今国际体系与秩序的基本性质以及中国其中的角色定位，对诸如“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内涵及其相互

关系,等等,不能总是“见仁见智”,必须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基本的共识。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中,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很不容易。

主要由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共同铸造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对战略的影响远比所谓“现实政治”(Realpolitik)逻辑要深刻、有力。“现实政治”的教条假定决策者能够使战略估算排除一切实用主义和权势考虑之外的因素,这本身就具有神话色彩和意识形态性质。因为,权势本身并非目的,它不过是那些控制着权势的群体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而已,而这些群体对利益的理解无疑深受其信念体系的影响。美国人一向自以为讲求实际,实际上其战略缔造就始终深受其世界观的影响。而美国的世界观由多种因素造就:与“旧大陆”分离的独特地理环境;丰厚的自然遗产;移民国家的文化多样性与偏狭的地方观念;充满活力的清教伦理;“美国例外、独特”的自我形象;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倾向;与美国“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优越感有关的孤立主义情结;开疆拓土无往不胜的历史经验和由弱到强的美国“奇迹”,等等。

宗教、意识形态、文化(包括政治与战略文化),大致都可归入广义的文化范畴。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总之,外交与战略研究的文化视角所触及的是许多本源性的、深层次的因素。国际问题研究不能“没文化”。连文化都没有,还谈什么创新?

#### 四 理论研究应以“人文为本、科学为用”

1. 记者:说到创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人一直在呼吁建立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举凡称得上“学派”的某个学者群体,或某种文化谱系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除了外在的组织形式与学术机制,一般都具有一些内在、独

特且相对一贯的学术共性与文化特征,如独特的学术风格、思想倾向、研究议题、理论范式或知识谱系依托。麦金太尔(Alasdair McIntyre)称之为“学统”(tradition of enquiry),即某种连续一贯的思想运动,它要求其成员对该运动的性质和方向有明确认识,积极参与其中的学术论辩并自觉推进其学术进展。

如果你所说的“中国学派”指的是这样的东西,那么,恕我直言,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有任何可能性。

如果你的意思是,理论研究需要联系中国的对外关系实践,解决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体现中国立场、中国价值甚或“中国经验”,那么,我认为这不仅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我觉得判断理论研究学术成就的首要标准,是看它们是否有助于理解、解释或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至于学术上能不能“开宗立派”,应该是这个实践过程中的一个自然产物,而不是首要目的。因此我更愿意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这个说法,因为“化”指的就是“过程”,而且有根据自身需要消化吸收、内外整合的意思。“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那怎么行?“中国化”的题中之义,就是使外来理论与本土资源都服务于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个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如此,也理当如此。

## **2. 那么,你如何理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方法论之争?**

各有所长,各司其职,相互滋养,相得益彰,我觉得这是常识。

国际政治与外交、战略问题,是高度实践性、政治性的领域,我无法设想理论研究可以无视历史经验和客观事实。历史研究提供的是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基本事实,如果脱离实践或者无助于理解现实,这样的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同样,也无法想象,历史研究或者具体问题研究不需要进行理论性的思考,甚至一定的理论指导。除了可能导致的其

他局限,我认为忽视理论思考,更进一步说,忽视有关国际政治的哲学思考,最大的危险是可能导致研究者失去目标感,丧失起码的价值判断能力。可能有人会争辩说,你这里所说的理论,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论。我不否认人们对“理论”的性质、内涵与功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我想强调的是,不要用过于狭隘的眼光去理解理论,更不要忘记,理论最大的价值,不在于能够帮助解决一些技术性问题,而是在于帮助我们确认那些具有长远和根本意义的目标和价值。

所谓“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的二分法有时也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二者泾渭分明甚至水火不容。实际上,规范理论既涉及价值,也涉及事实,例如那些具有规范性内容的国际规则、制度或惯例(如关于战争行为或人权的规则),因此同样具有经验性质;而所谓经验理论其实也隐含着规范性前提和价值基础。

国际政治“科学”的基本方法和研究手段,其核心是“有办法”。作为知识和技能,经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一般不难掌握。这方面我们的确需要补课。而人文主义取向,不仅是一种研究途径,更是一个塑造价值立场、伦理修养和思想境界的过程,需要长期、主动的智识累积、思想积淀和精神砥砺,其核心是“有思想”。思想不是科学,而是产生科学的能力。思想或许并不是理论,却是理论的血脉;思想也不是知识,人们不能学思想,只能去思想。

17世纪以来就有笛卡尔式与帕斯卡式的思想方法之间的分歧,19世纪中叶以后更有事实与价值之关系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人们已认识到它们其实并无优劣之分。韦伯早就指出两者各有其作用范围与合理性。我们既需要国际关系的科学理论来解释现象,也需要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来为实证科学提供思想和价值基础。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其中心点是人、人类的价值和能力。人道主义的核心是对人类利益、需求和福祉的关心。人文与科学,在一定意义上是



目的与手段、体与用的关系。对于两种性质大不相同而又各有其长、缺一不可的东西，厚此薄彼或者非此即彼，不必要，也很荒谬。

## 五 “现实主义”不等同于“现实”

记者：但人们一般认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权力政治”，不大理解为什么要关注政治伦理、文化价值观之类的问题？

这并不矛盾。政治有许多维度。其实，经典现实主义者都很重视伦理思考，摩根索的“六原则”有3条半就与此有关。伦理思考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国际关系的实践伦理，其核心就是面对各种道德困境时的选择问题。摩根索提供的只是一种选择。如果现实世界人人都是这种选择，他还用费这么大劲儿去解释吗？

有些人总以为国际政治只关乎权力与利益，而无干伦理与正义，谈论伦理道德就是理想主义。这种观点貌似深刻，其实肤浅得很。《孟子》里有个故事：有人说，有时候要吃饭就得“不讲礼”，可见“食”比“礼”更重要。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矛盾似乎很让人犯难。孟子却说，问题很简单，我们说金子比羽毛重要，难道是说三钱多重的金子比一大车的羽毛还重吗？扭断哥哥的胳膊，抢夺他的食物，就有吃的了，那你要不要去扭、去抢呢？拿一件事的重要方面与另一件事的次要方面相比较，何止于吃饭比“讲礼”重要？睡觉也可以比吃饭重要！

再如，战争和战略从来不是一元的或纯军事现象，而是受到众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从外部环境到国内基础，从显而易见的地缘政治、经济因素，到极其微妙的人类心理与情感。对于战争等大规模、有组织暴力使用的道德评判和论辩，从来就是政治哲学、政治伦理和政治实践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与此相关的原则、信念或精神状态对战争发动者、